



在海岸 另一端的工作

印度班加罗尔的一个医生正在和美国的医师讨论一幅扫描图。

David T. Coe

服务外包
可能会影
响工业国
的经济以
及它们对
待全球化
的态度。

中国以及近来的印度正作为主要贸易大国迅速崛起，同时一种新型的国际商务正在形成——有技术支持的离岸工作，尤其是一度没有受国际竞争影响的工作。

中国在世界出口中份额的迅猛增加以及印度份额的增大（见图1）已经被承认为国际经济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会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工资和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越来越明显，离岸工作——把一些生产中间产品的任务或工作，包括服务，外包给其他国家——能够对发达国家的就业、相对工资和工人的就业安全感都会产生潜在的长远影响。

从长远看，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同意，近期全球化的加速将对发达经济体和它们的新兴市场贸易伙伴都有着有利的影响。但从短期来看，尤其对那些劳动市场缺乏弹性的国家存在破坏作用。此外，相当数量的潜在可离岸外包的工作已经把更多的新劳工群体卷入了国际竞争，这些工人可能会日益成为特殊利益保护主义者的附和群体。

在许多发达国家，一些商业服务的离岸外包现象已经引起了争论。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里高里·曼昆(Gregory Mankiw)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兰·布兰德(Alan Blinder)的观点在学术界是最具代表性的两方。

在2004年，时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的曼昆认为离岸外包会对经济产生长远的正面效应，与传统的商品贸易没有本质的区别。阿兰·布兰德——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成员、美联储委员会前副主席——认为这个争论与他所知道的基本经济利得无关，而是关于中国和印度融入世界经济到底是一个“重大事件”，或者仅仅是一个“普通事务”。布兰德(2007)认为，发展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它们促使工业结构、工作形态、工资、就业安全感、劳动力流动性和——至少在短期内——就业和失业发生重要变化。

离岸外包到底是一个重大事件还是一个普通事务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有多少工作岗位已经失去，有多少工作可能会失去，新的工作岗位以多快

的速度创立，对不同类型工人的收入和就业安全感的潜在影响，以及这个转变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有多顺利。

离岸外包的威胁

关于离岸外包到底造成了多少发达国家的工作岗位的消失没有确切数据，但估计显示，在美国，影响局限于总就业的大约0.3%—0.7%，同时对欧洲国家也有一些估计（Baldwin,2006）。然而，有证据也显示服务离岸外包在近年来已经稳定发展起来。

服务部门潜在的工作岗位受离岸外包的影响相对来讲更大。Van Welsum 和 Vickery(2005)估算，2003年，欧盟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就业可能会由于可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的服务外包而受到的影响接近20%。布兰德对美国的估计更高，为22%—29%。其他的研究也有着更高的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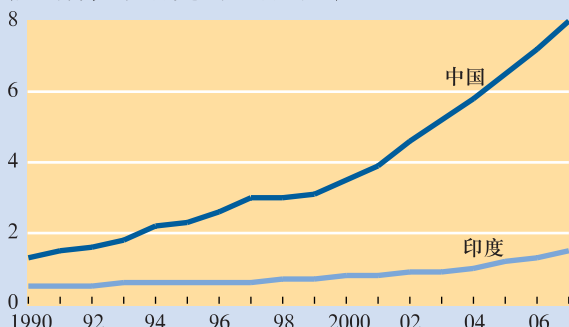
在公共辩论中，对服务业部门（该部门可能面临着国际竞争）就业岗位的潜在数量的估计与实际失去的就业岗位数量估计之间的区别常常被搞混了。有些辩论经常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就是工业国的任一服务部门就业岗位在国际竞争中都没有比较优势。就是说，工业国只有离岸外包，而没有吸引或者到国外去承包工作。但是美国、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都是服务贸易的净出口国，近些年来净出口顺差还越来越大。所以发达国家的在岸服务可能比输出的离岸外包服务更多。另外，一些离岸外包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使他们增加雇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例如，在英国，进口服务的公司比那些不进口服务的公司有着更高的雇工增长率（Hijzen 等人，2007）。

图1

加大的压力

自199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的份额急剧增加，同时印度也在增加。

（占世界商品和劳务总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收入和就业安全感

一个重要问题是离岸外包对工人相对工资差异的影响是否超过早期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如果离岸外包减少了中高技能工人的收入而不是主要减少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像过去技能偏向型技术的变化和全球化中的情况那样，由于大多数人中高技能工人以前没有受到国际竞争的影响，更有可能的是，离岸外包将会是发达经济体的重大事件。熟练工人工资下调压力的可能性被大量的有趣证据所证实：印度工人为发达经济体的病人读X光照片，为发达经济体的公司开发软件，并为发达经济体居民准备税务报表。而且，一些低技能工作——像那些园丁、垃圾收集搬运夫和看护人所做的工作——以当前的技术不可能让外国人做，这表明这些类型工作的工资不可能受离岸外包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特定国家，伴随着对收入的压力，对高技能的服务工作是输出去离岸外包还是在岸提供服务将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虽然一些熟练的服务离岸外包在印度的许多城市，如班加罗尔快速发展，但鉴于提高大多数人的教育质量和教育平均水平都很困难，看来新兴市场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优势将会在中低技能工种的水平上持续一段时间。

一般来说，离岸外包似乎不会对发达经济体的熟练工种产生大的影响。当然，如果工业国可以离岸外包的熟练工种被外包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然而，到目前为止，离岸外包的影响好像与许多文献的发现相吻合，即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倾向于使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减少。

离岸外包也可能对工人真实的或感觉到的就业安全感和劳工谈判力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美国有这样的证据，例如，产业工人和涉及贸易商品岗位的工人比其他行业和职业的工人显示了较高水平的经济不安全感。自然不用说，如果离岸外包对工人的影响是突如其来、难以预料的，这种不安全感将增加，正如普遍可见的情况一样。

转变有多曲折？

离岸外包的增长是平稳进行的还是大规模和突然的转变，这取决于多种宏观经济和结构因素。重要的因素包括中国和印度以及它们工业国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贸易和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决定着世界经常账户差额的总体规模和结构。结构性政策也很重要，因为劳动和产品市场富有弹性、有良好的教育制

度和培训体系、有有效的就业和创新政策的国家能更容易而且快速地适应由于贸易和离岸外包增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变得可贸易的工种的实际数量以及其开始贸易的速度也取决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发达经济体承包新型工作的能力。正如前面提到的，似乎中国和印度在技术更先进的服务领域开发出具有广泛基础的比较优势尚需要一段时间。在印度，新型在岸工作能力的提高也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在中国，需要加强英语技能、保护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以及加强法规的执行。这些结构性问题暗示了转变的长期性。

转变也取决于中国和印度称职的、数量有限的熟练工人工资的发展前景。中国沿海地区和印度班加罗尔已经有实际工资提高的不确定信号和劳动力短缺的有趣证据。其他的事情也一样，中国和印度的主要地区实际工资的上涨将削弱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且限制它们从发达经济体承包工作的数量。

最后的问题是其他的发展中和转轨国家将有多少国家会作为离岸外包目的地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并且以多快的速度参加。到现在为止，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中亚和南美的许多国家几乎没有参与。由于地理接近、文化和语言相似、中国和印度散居海外的人口的独特作用等许多原因，其他国家可能很难仿效中国的和印度近期作为离岸外包目的地所取得的成功(Coe, 2007)。

转变的时间越长，中断的可能性越小。但是不管转变时间多长，中国和印度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可能对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和就业安全感产生持久影响是很显然的。

全球化和不公平

在近期全球化加剧的同时，工业国的许多工人对经济不平等的感觉持续不断。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原因还没有被充分了解，但是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与全球化相比是使工资离散程度增加的一个更强有力的驱动力，全球化本身是科技进步的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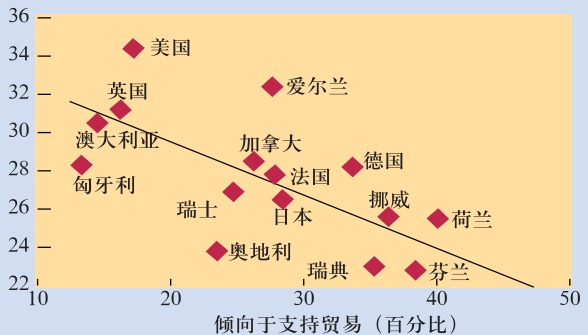
虽然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已经非常普遍，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不平等程度特别严重。当将收入最高的人口和其余人口的收入分配加以比较时，不平等特别明显。例如，在美国，以一些标准来衡量，当今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超过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而且不仅仅低技能的工人受影响，受过相对较高教育的工人也正经历真实工资的下降

图2

不平等和贸易观点

在工业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对贸易的态度就越不支持。

基尼系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 Förster和Pearson(2002);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07)。

注: 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0代表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相同收入); 100代表完全不平等(一个人拥有全部收入)。这里给出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贸易的态度来自于2003年的调查。

(Aldonas、Lawrence 和 Slaughter, 2007)。

全球化的加速和一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相一致对公众支持全球化有重要意义。当全球化正在提高一些人的收入时，而收入依然停滞的选民由于没有从全球化中收益，他们将会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并且可能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损失者。如果选民——正确地——把技术当作收入提高的驱动力时更是如此。因为贸易增加可能是技术变化最明显的表现。而且，尽管选民有政治力量去影响减慢、停止，或甚至逆转全球化进程的政策，但他们不可能对技术进步速度产生大的影响。

许多国家的民意调查表明，个体的相对经济地位和对贸易的赞成态度有很强的正相关(见图2)。例如，Aldonas、Lawrence 和 Slaughter (2007) 认为，美国人民正在变成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因为工资停滞或者下降，而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全球化的利益。这暗示了公众同意胜利者从贸易自由化获得的好处超过失败者的损失。但是他们也理解，只有当对损失者进行实际补偿的时候(然而他们却几乎没有得到补偿)，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才能通过自由化而得以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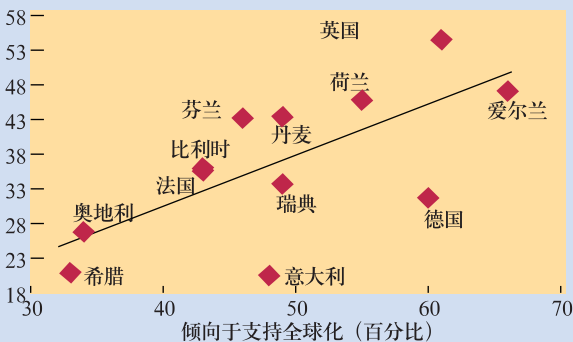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离岸外包的增加最重要的政策含义可能在于其与许多发达经济体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广泛扩大的感觉相吻合。大量潜在的外包工作使白领工人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许多白领工人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如果大量的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可能受到外包的威胁，并且来自全球化的利益没有被公平分配，他们可能会逐渐支持特殊利益的保护主义。

图3

收入转移和全球化

在欧元区，重新分配到最贫穷30%人口的收入越多，对全球化的态度越是肯定。

(收入向最贫穷的30%的人口转移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Förster和Pearson (2002)；欧洲委员会 (2003)。

注：收入转移数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全球化的态度来自于2003年的一项调查。

达成共识

决策者需要确保贸易利益被广泛分享，并且确保社会政策适当地便于调整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对工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是改善教育和培训，这对成功应对全球化非常关键。但在短期内效果可能有限。教育改革常常难以执行，并且只有当新一代的学生完成他们的教育时才能发挥作用。

在与政治决策相关的时间框架里，重新分配政策对损失者或者有很小获胜机会的人进行补偿可能是

获得继续参与——或者防止倒退——全球化政治支持的关键。这在欧盟中好像是事实：更多地进行重新分配的国家是那些多数国民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将贸易总收益支付给工作年龄人口中收入最低的30% (图3)。虽然需要对全球化损失者给予补偿的观点得到广泛支持，但是如何做得最好的问题却没有受到很多的注意。然而，近几年来全球化本质的不断变化表明：在一些国家，因为现在比较多的工人可能认为自己是损失者，这个问题可能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因此，为了维持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补偿范围可能需要拓宽，从狭义地认为贸易自由化导致失业的工人扩展到包括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在业工人。然而，重新分配将会有不利的激励效果，减少全球化的经济收益。这使设计有效的重新分配方案以使全球化的净收益最大化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运行相对较好、对工作保留激励作用的重新分配方案容许一个国家从全球化获得一个相对大的净收益 (Snower 和 Coe, 2008)。很幸运，存在相对有效的重新分配方案的例子：美国的收入所得税抵免和英国的家庭收入税抵免是其中的例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6)。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于正在进行的重新分配是否足以创建和维持对全球化的支持力量也存在疑问。

David Coe, 国际货币基金亚太部高级顾问。

本文以Coe(2007)所写的一篇文章为基础，当时作者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访问学者。

参考文献:

Aldonas, Grant, Robert Lawrence, and Matthew Slaughter, 2007, "Succeed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New Policy Agenda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Financial Services Forum Policy Research Paper*, June.

Baldwin, Richard, 2006, "Globaliz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s)," *paper for the Finnish Prime Minister's Office, 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 as part of EU Presidency, September*.

Blinder, Alan, 2007, "Offshoring: Big Deal, or Business as Usual?" *CEPS Working Paper No. 1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Coe, David, 2007, "Globalisation and Labour Markets: Polic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nd India,"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63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Globalization," *Flash Eurobarometer No. 151b*.

Förster, Michael, and Mark Pearson, 2002,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in the OECD Area: Trends and Driving Forces," *OECD Economic Studies, No. 34, pp. 7-39 (Paris)*.

Hijzen, Alexander, Mauro Pisu, Richard Upward, and Peter Wright, 2007, "Employment, Job Turnover and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Firm-Level Evidenc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GEP Working Paper 2007/37, August*.

IMF, 200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2007, "National Identity".

OECD, 2006, *Boosting Jobs and Incomes: Policy Lessons from Reassessing the OECD Jobs Strategy (Paris)*.

Snower, Dennis, and David Coe, 2008, "Globalization Through Redistribution,"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orking Paper (forthcoming)*.

van Welsum, Desirée, and Graham Vickery, 2005, "Potential Offshoring of ICT-Intensive Using Occupations," *DSTI Information Economy Working Paper DSTI/ICCP/IE(2004)19/FINAL/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references to additional papers, see Coe (2007).